

福建移民史

主编 林国平 邱季端

副主编 张贵明



方志出版社

福建移民史

主 编 林国平 邱季端
副主编 张贵明

方 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建移民史/林国平、邱季端主编.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5. 1

ISBN 7—80192—410—X

I. 福… II. ①林…②邱… III. 移民—历史—研究—福建省 IV. K29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7641 号

福建移民史

主 编: 林国平 邱季端

责任编辑: 张维义 管旬辉 卫家雄

出 版 者: 方志出版社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 12 层)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fzph.org>

发 行: 方志出版社发行部

(010) 85195814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法律顾问: 北京市京诚律师事务所

印 刷: 福州晚报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0.5

字 数: 761 千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册

ISBN 7—80192—410—X/K · 309

定价: 8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林国平，1956年生，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闽台文化研究所所长。著作有《林兆恩与三一教》、《闽台民间信仰源流》、《闽台区域文化研究》（主编）、《福建省志·民俗志》（主编）、《福建民间信仰》（合著）、《闽台宫庙壁画》（合著）等，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多项研究成果获教育部和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8年被评为福建省高等院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福建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入选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2001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邱季端，1942年出生于福建石狮，1962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3年移居香港，香港海洋夹布海棉厂有限公司董事长，历任香港协进联盟首届中央委员、旅港石狮同乡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校友会会长，福建社团联合会常务执委、福建同乡会、厦门联谊总会永远名誉会长和副理事长。1982年后回祖国大陆投资，捐助教育、慈善事业5000多万港元。现任福建省政协常委、北京师范大学校友总会副会长和客座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客座教授。2004年获世界华商投资基金会颁发的世界杰出华人奖及美国摩利臣大学颁授的荣誉哲学博士学位。

目 录

绪 论	(1)
-----	-----

上编：福建移民史略

第一章 先秦及闽越国时期移民	(15)
第一节 远古时期人类迁徙	(15)
第二节 商周时期居民分布	(17)
第三节 闽越移民社会的形成	(22)
第二章 汉唐时期中原汉族入闽	(25)
第一节 汉代与三国移民	(25)
第二节 晋代与南北朝时期移民	(27)
第三节 唐代前期移民	(30)
第四节 唐末五代移民	(35)
第三章 宋元时期福建移民	(39)
第一节 北宋时期北方移民	(39)
第二节 南宋时期北方移民	(40)
第三节 元代北方移民	(43)
第四节 宋元时期外国人移居福建	(46)
第四章 明清时期福建移民	(55)
第一节 明清时期福建省内再次移民	(55)
第二节 闽人向江西浙江移民	(78)
第三节 闽人向广东移民	(115)
第四节 周边省份向福建移民	(127)
第五章 福建向台湾移民	(147)
第一节 荷据以前闽人移居台澎地区	(147)
第二节 荷据时期闽人移居台湾	(150)
第三节 明郑时期闽人移居台湾	(159)
第四节 清统一台湾后闽人移居台湾	(169)
第六章 闽人向海外移民	(184)
第一节 闽人移民日本	(184)
第二节 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	(203)
第三节 闽人向东南亚移民	(214)
第四节 闽人向欧美移民	(234)
第七章 现代福建移民	(246)

第一节 省内移民·····	(246)
第二节 省际移民·····	(273)
第三节 东南亚归侨·····	(283)
第四节 港澳移民·····	(288)
第五节 海外新移民·····	(295)

下编:移民与福建社会

第一章 移民与民系·····	(304)
第一节 移民与汉人六大民系的形成·····	(304)
第二节 汉人民系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317)
第二章 移民与家族·····	(324)
第一节 移民与家族制度·····	(324)
第二节 移民与家族寺庙·····	(330)
第三章 移民与方言·····	(341)
第一节 移民与福建方言的形成·····	(341)
第二节 移民与福建方言的流播·····	(344)
第四章 移民与宗教信仰·····	(348)
第一节 早期北方移民与宗教传播·····	(348)
第二节 隋唐五代移民与民间信仰·····	(354)
第三节 明清时期福建移民与台湾民间信仰·····	(357)
第五章 福建姓氏源流·····	(363)
第一节 福建姓氏概况·····	(363)
第二节 福建十大姓氏源流·····	(366)
第六章 闽籍华侨对福建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	(377)
第一节 闽籍华侨对近代福建经济发展的贡献·····	(377)
第二节 闽籍华侨对福建其他事业的贡献·····	(384)
第三节 闽籍华侨参与福建经济文化建设的原因及作用·····	(389)
第四节 闽籍华侨对现代福建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	(394)
第七章 闽籍台湾同胞对福建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	(415)
第一节 闽籍台胞对近代福建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	(415)
第二节 闽籍台胞对现代福建经济发展的贡献·····	(439)
第八章 闽籍港澳同胞对福建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	(453)
主要参考论著·····	(478)
后 记·····	(482)

绪 论

关于现代人来自何方？学术界有各种推断。达尔文最早提出人类起源于非洲，这种推断在非洲的考古发现中不断找到大量的例证，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1994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距今440万年前猿始祖化石，是目前教科书上记载的“人类最早的祖先”。最近，法国科学家在肯尼亚发现距今600万年前原始人类化石，取名为“千禧人”，并称其已经具有直立行走能力，又把人类的最早祖先推前了160万年。但可以肯定，这些新发现的人类化石并不意味着就是人类的始祖。一方面，随着考古的发现，必将有更古老的人类始祖化石被发现；另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人类的进化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不能排除人类起源于亚洲的可能性。特别是中国，拥有广大的新生代地层，有温暖和寒冷气候变化交替的记录，在这些地层中已发现大量的高等哺乳动物化石的灵长类化石。1929年底，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被作为人类起源于亚洲的有力证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在云南发现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在河北蔚县找到一件距今300万年前的石器，从而对人类非洲起源论提出挑战。

对于人类起源于何方，学术界还将会继续争论下去，并且在短时期内不会达成共识。但人类是流动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人类犹如涓涓泉水汇成江河溪流、又汇成浩瀚无际的大海一样，从非洲或亚洲或其他地方出现，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空间，不断地迁徙，从一个迁徙地到另一个迁徙地。他们在迁徙中不断地繁衍，扩大分布范围，足迹遍及世界。人类在迁徙过程中，一部分人会就地定居下来，一部分人继续迁徙。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的迁徙史或移民史。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是移民。

关于“移民”的概念，众说纷纭。《大美百科全书》：“广义而言，人类的迁移是指个人和一群人穿越相当的距离而作的永久性移动。”^①《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移民是指人口在地理上或空间上的流动，或在不同地区间的移动，从原住地移到目的地，因而居所发生改变。这种迁移是属于永久性的。”^②《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移民是“人们离开原住地，超过一定行政界限，到另外一个地方居住的移动”，而“实行迁移的人口称为移民”^③。《简明中国移民史》：“我们对移民的界定是：具有一定的数量，一定的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的时间的迁移人口。”^④我们认为，“移民”的概念应该包含三个要素，或“三性”：一是

① 《大美百科全书》第十九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年版。

② 《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社会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

④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要有一定的人数，即群体性；二是要有一定的迁徙距离，即空间性；三是要在新的地方定居下来，即时间性。

在漫长的人类原始社会，原始人迁徙的冲动，完全来自动物求生的本能。为了寻找更多的食物，满足饥肠辘辘的需要，他们凭借坚实的双脚，追逐野兽，跨越万水千山。后来，有了车船舟马，或逐水而行，或逐草而居，迁徙的速度加快，规模也扩大了。

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移民的动因逐渐复杂，形式也多种多样。但基本动因还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最常见到的形式是自发的经济性的移民活动。如果从中国甚至世界这样的大范围来观察人类的移民历史，那么经济性的移民活动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中。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移民形式，以中国古代为例，主要有以下几种：

政治性移民 是指出于政治目的，运用政治手段强制或鼓励百姓从原居地迁往指定的地点居住。如秦始皇为了“实关中”，以加强统治，在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运用政治力量将天下的 12 万户豪富强行迁往咸阳，把关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政治中心。同时，为了北戍五原、云中，南戍五岭，强制移民人数均达数十万人，对长城沿线和华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汉承秦制”，继续奉行“实关中”和移民戍边的政策，汉武帝元朔二年（前 127 年）移民 10 万人于朔方。元狩四年（前 119 年），72 万多灾民被迁往河套地区、河西走廊等地。元狩五年（前 118 年），数万“天下奸猾吏民”被迁往边区。在 20 多年时间里，完全由政府实施的移民不下 120 万人。此后，历代统治阶级都进行政治性移民，如北魏太和十七年（493 年），孝文帝决定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至太和十九年（495 年），平城周围的官民百姓全部迁至洛阳及周围地区，总数超过 100 万人。明朝建立后不久，即着手组织人口迁移，如“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徙“沙漠遗民”屯田北平附近，徙江西农民于云南湖广，等等，故史籍称“太祖时徙民最多”。清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制订优惠政策，鼓励移民迁入四川，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由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福建及贵州、陕西等地迁入四川的移民及其后裔达到 600 多万人，占当地总人口 60% 以上。咸丰十年（1860 年）起，清朝开放东北“封禁地”，以后又采取鼓励政策，山东、河北及北方各地的移民大批迁入东北，至清末，移民累计超过 1000 万人。

军事性移民 是指由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产生的人口迁徙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战争掠夺人口；二是将士或家眷留驻当地。如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平定岭南，就有数万征战的将领、士兵留驻，与当地人的融合，中原文化开始浸润岭南。唐代天宝九年（750 年），南诏阁罗凤掠取三十二夷州；大（太）和三年（829 年）南诏陷成都，又掠子女百工数万人而去。明初组织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戍边，历经正统、嘉靖、万历诸朝，汉族移民大量进入边境，出现移民高潮。史书记载，“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矣。”前往云南屯田的移民多达四五十万人。

灾荒、战乱移民 是指因逃避自然灾害和战乱等而发生的人口迁徙活动。中国古代的自然灾害和战乱经常发生，由此引起的移民浪潮也接连不断。如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促成大规模人口迁移，灾民从战乱最烈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迁出，大部分向南迁至长江流域。两晋南北朝时期，在长达一二个世纪的动乱中，上百万的黄河流域的百姓纷纷南迁避难，仅据官方统计，公元 313~450 年之间，北方南渡的人口即达 90 万人，占北方

原有户口的七分之一，实际规模当远在上述官方统计之上。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再度引起人口南迁的大潮，其余波一直持续到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靖康之难”以及其后长达100余年的宋、金对峙，频繁的动乱逼迫北方百姓背井离乡，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不亚于“永嘉之乱”和“安史之乱”。清末，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破产农民不顾清廷禁令，携家带口涌入东北，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东北地区的总人口已突破300万人，比100年前猛增了七八倍。

近代，中国的移民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向海外移民的规模迅速扩大。中国居民移居海外，至少已有3000多年历史。目前，一般把移居外国或在侨居国出生，仍保留中国籍的中国人称“华侨”；这些人若放弃中国籍加入外国籍则称“（外籍）华人”，其后代即称“华裔”。在古代，华侨往往自称“唐人”，这一方面说明唐朝国势强盛，影响远播；另一方面也说明唐代的海外移民人数可观。大体上说，中国强盛时，对海外的开拓性或经营性移民较多，中国动乱时，则以避难或流亡式移民较多。

清朝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严禁向海外移民。《大清律例》第225条即明文规定：“一切官员及军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海经商，或移住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罪》处斩立决。”但仍有不少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冒险赴海外谋生。据记载：“闽、粤之轻生往海外者，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良由生计日繁，地狭民稠，故无室无家之人，一往海外，鲜回家者。”^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人得不到异国他乡谋求生路，形成向海外移民的高潮，并一直持续到整个民国时期。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一百年间，中国向海外移民人数多达1000万人。移民形式主要是契约劳工和“猪仔”，至20世纪初才转为自由移民。迁出地主要是广东、福建，而迁入地则为东南亚，也有一小部分迁至欧、美各地。

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移民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工程移民，即由于大规模的工程（水库、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等）建设的需要而造成的移民活动。以水库建设为例，20世纪50~60年代建设的新安江水库、三门峡水库和丹江口水库均产生数十万移民，目前，在建的三峡工程动迁人口达百万之众。据估计，1949年以后，工程移民总数在4000万人以上。

二是城市化移民，即城市化建设中，外地人口（以农民为主）涌入城市，部分人定居下来，成为移民。最典型的是深圳，它原来是一个渔村，后在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吸引下，来自各地的人群汇集在这里，很短的时间里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在全市现有的453万总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外地移民来的，所以，深圳也是一座完全的移民城市。香港现有的600万人口中，已很难找出最初的土著，只有谁先来、谁后到之别。上海全市总人口约1500万人，外来人口约400万人，台湾同胞在上海定居的也有二三十万人。北京的移民潮从1949年以来一直未曾停止，北京现有人口约1400万人，外来人口约300万人。除此之外，广州、

^① 以上移民的形式，参见电子图书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210.5.135.242/Basic/EBookLib/JX-CKS/TS090037/。

南京、海口、重庆、乌鲁木齐、澳门也都是移民人口比较多的城市。

三是海外新移民。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对外移民浪潮，但不同于1949年以前的契约劳工和“猪仔”，主要移民形式是家庭团聚、留学、商业与技术移民，除一般劳动者外还有相当比例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因此，学术界称之为“新移民”。这次移民潮方兴未艾，总人数估计在400万人左右（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和东南亚各地的再移民，大陆移民约100万~150万人）。海外新移民的迁出地也从沿海几省扩大到全国各主要城市，而移入地则集中美、加、澳和西欧各国，迁入东南亚的为数不多。

总之，从中国乃至世界的范围上看，移民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其范围不断扩大、速度逐渐加快，形式不断增多，作用也逐渐增强。

二

福建地处中国的东南，气候温暖，雨水充沛，自然条件优越，非常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距今18万年以前，福建中部的三明境内就有原始人类出现，很有可能就是从云南或其他更早于此地出现人类的地区迁来，然后继续向南迁移。距今4万~8万年前，闽南的漳州也有原始人生活，并越过台湾海峡，成为在距今2万~3万年前的台湾“左镇人”的祖先。距今1万年前，在福建的武夷山、三明、清流、泉州、厦门、漳州、东山、宁德、龙岩等地区都发现原始人活动的遗迹。这些远古人类往往以洞穴为家，过着狩猎、捕捞和采集生活。由于群体的发展和生存的需要，他们居无定所，常常迁徙。我们从福建原始人类的遗骸和遗物中可以看到他们在蛮荒大地上艰苦跋涉的身影。

大约在距今1万年至4000年前，福建先民的分布范围已经遍及全省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的特点是“大分散，小聚落”，表明福建先民逐步由迁徙不定的、以游猎和采集为主的生活走向定居的、以原始农业为主、以采集和捕捞为辅的生活。因此，在福建各地不但产生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且逐步形成古代原始民族——闽族。在青铜时代（夏、商、周时期），福建各地已有古老民族“闽族”或“七闽”出现。他们有众多的支系或族团，由此形成闽中地区多样性的文化面貌。随着闽族人群的扩大及经济文化的发展，闽人不断迁徙、开垦，在蛮荒之地逐步建立起一个又一个居民点，其范围遍及福建各地，并且进入今福建毗邻的周边地区（如浙南、赣东北、粤东）。

战国晚期于越人大批南迁，进入闽中之后，他们与当地土著闽人结合而形成闽越族。无诸作为句践子孙，凭借才干和实力，逐步消灭割据局面，统一闽中各地的主要闽族支系和于越族武装，并乘战国之世、诸侯争立的机会，自封“闽越王”，建立闽越国，并奉祀越国先祖。这些措施，既加强了越人的统治地位，又加速了闽、越两族的融合。秦始皇在扫灭六国之后，曾经陈兵闽越边境，但无力荡平“逃入深山林丛”的越人，只能虚设“闽中郡”而已。

汉初，朝廷无力进入闽越地区直接实施统治，汉高祖复立无诸为闽越王，无诸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才干，结束了闽中地区种族分隔与政治势力割据的局面，建立起统一的闽越王国。无诸立国后，与汉廷保持良好关系。无诸之后，拒绝向汉廷朝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馮善公开反汉，汉武帝下令发四路兵马征讨，翌年，闽越国投降。汉武帝认

为，闽越地势险要，而越人驍悍多反复，路远难制，遂下令“悉徙其众于江淮之间，东越地遂虚。”迁徙的民众估计有10万人左右，这是汉廷继南海、东瓯国之后，对闽越人第三次采取“虚地徙民”政策，也是最大的一次政治移民。汉廷在闽中仅留下少量驻军，由都尉下属的候官率领。大批闽越宗族和军队被迫迁往江淮之间，其他闽越人大多逃亡进入山林，成为后世之所谓“山越”。原先繁华的都城大邑，一炬成为废墟。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史因而停滞近300年。

闽越国灭亡后，西汉中央政府派遣大批军队入闽，并在闽中设立冶县（今福州市），加强对闽中之地的实质性管治，这就为北方地区汉族人民的入闽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东汉时，冶县更名为东侯官，即是中央军队驻扎闽中的明证。尽管如此，由于汉代的闽中仍然是偏僻的边疆，人烟稀少，除了驻防的官吏和军队外，见诸文献记载的流寓很少，且大多数带有一些神秘的色彩。虽陆续有中原官吏、军队驻防闽中，以及一些避世亡命者进入闽中，但数量毕竟有限。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兴起，人民四处逃亡，闽中既为人烟稀少的边陲之地，不少逃亡的中原汉民，便开始批量入闽。特别是孙吴集团崛起于江东，为了扩展势力范围，着意向南发展，经营闽中，先后五次派遣军队入闽，更带动了大批北方汉民入闽。经过东汉末、三国时期北方人民的南迁，在闽中的闽江流域及沿海地区，北方汉人的移民社会已经形成初步的规模，这一时期闽中的人口数量大约在10万~20万人之间。^①

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人陆续迁入福建，出现第一次北方汉人入闽高潮，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西晋末永嘉年间（307~312年），为了躲避战乱，北方汉人的大批入闽。志书称：“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仕宦名迹，鲜有闻者。”^②实际上入闽的远不止八姓。第二次发生在东晋末年，卢循率农民起义军攻入晋安，在福建活动达三年之久。失败后，其余部散居在福建沿海。第三次发生在南朝萧梁末年，侯景之乱，福建成了避乱之所，移民的数量很多，处境悲惨。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人入闽的主要路线大致有以下几条：（1）由江西鄱阳、铅山经分水关入闽；（2）由江西临川、黎川越东兴岭经杉关入闽。这一条路较为平坦；（3）由闽浙边界山口入闽；（4）由海路入闽。这一时期北方汉民的入闽，不仅增加了众多的劳动力，而且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从而使闽中的许多地区得到开辟耕作，社会经济逐渐发展。

唐代前期，出现第二次北方汉人入闽高潮。唐初，九龙江流域爆发所谓“蛮獠”的“啸乱”，唐高宗麟德年间（664~665年），朝廷派曾镇府驻扎九龙江东岸。总章二年（669年），复派陈政、陈元光率府兵三千六百多名，从征将士自副将许天正以下一百二十三员入闽。平定叛乱后，朝廷准元光之请，在泉、潮之间置漳州，委陈元光任漳州刺史，把所属军队分布于闽南各地。陈军将士所到之处，且守且耕，招徕流亡，就地垦殖，建立村落。根据近人的统计，先后两批府兵共约七千余人，可考姓氏计有六十余种，还有随军家眷可考姓氏者四十余种，这数十姓府兵将士及其家眷，繁衍生息，形成了唐代开发九龙江流域的骨干力量，逐

^① 参见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第二章《秦、汉、三国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② 乾隆《福州府志》卷二五《外经》引路振《九国志》。

渐缩小了与泉州等地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如果说第一次北方汉人入闽高潮主要是灾荒和战乱移民为主的话,那么这一次入闽高潮则是以军事移民为主。

唐代五代,中原战乱加剧,军阀各据一方,民不聊生,北方士民再次南迁,形成汉人入闽的第三次高潮。其中尤以王潮、王审知兄弟率部入闽的数量为巨。光启元年(885年),王氏部队进入福建,并逐渐控制整个福建,后来其子弟建立了闽国,在福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性割据政权。这次入闽的北方汉民主要由这样几部分组成:一是随王潮、王审知兄弟入闽的军队和家族,利用政治上的优势,各自在福建寻找合适的地点定居下来,从而成为地方上的显姓;二是众多北方的政客、士子、文人入闽;三是漂泊不定的僧人;四是北方各地的士民,其中包括士宦、流卒、商贾及一般的贫民。

宋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继续南移,北方汉人大量向南方迁徙,已成为当时人口发展的一种趋向。自北宋以来,北方汉民在和平环境里迁移入闽的数量有明显的增长。北、南宋之交及宋元之交的战乱,促使许多北方汉民纷纷迁移入闽。朱熹在《跋吕仁甫诸公帖》中说:“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①庄季裕在《鸡肋篇》中云:“建炎之后,西北流寓之人,遍满于江淮、湖广、浙、汀、闽。”宋元时期北方汉民入闽后,相当一部分落居于闽西、闽北地区,促使这一地区人口数量显著增长,进而促进闽西、闽北山区经济、社会的迅速开发。

在“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宋元时代,外国人大批移居福建,众多的“蕃客”侨居在泉州、福州等沿海港口,形成“蕃坊”、“蕃人巷”;他们还在侨居地建“蕃学”、传“蕃文”、播“蕃俗”;有些长期侨居的蕃客还与本地人通婚,出现“夷夏杂处”的局面,成为宋元福建移民史上的一大特色。

明清时期,随着北方移民不断入闽和人口的繁衍,福建人稠地狭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所谓“闽中有可耕之人,无可耕之地”^②,“十五游食于外”^③。因此,这个时期的福建移民出现两大新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结束了一千多年以输入人口为主的移民史,开始以输出人口为主的移民史。输出人口的主要地区有:

1. 向周边省份移民。主要迁移到江西、浙江和广东等省丘陵山区,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和粮食生产,也有的从事手工业生产等。众多闽人在山区搭棚居住,被称为“棚民”。他们披荆斩棘,用自己的血汗改造了许多荒山旷野,对促进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 向台湾移民。台湾与福建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宋、元之时,闽南人移居澎湖,聚居繁衍,元朝政府还在澎湖设立行政机构——巡检司,征收盐课,行使管辖权。还有少数闽人登上台湾本岛,聚居在台湾西部沿海。明末清初,福建向台湾移民的人数大增。明末郑芝龙占据台湾时,曾到闽南招募上万饥民去台湾垦荒,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活动。1624年至1662年,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湾时期,也有不少福建人移居台湾,在赤嵌附近形成了一个约有25000名壮丁的居民区,全岛约有4.5万~5.7万人。1662年郑成功

① 朱熹:《晦庵文集》卷八三。

② 谢杰:《虔台倭纂》下卷。

③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

收复台湾后,除了郑氏军队外,又新增加移民2万~3万人,使台湾的汉族移民增至10万~12万人,与土著居民的人数差不多。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清政府取消海禁,福建向台湾移民出现新的浪潮,对台湾的开发作出重大贡献。乾隆三年“台地袤延千余里,居民骈集,田园宽广。”^①

3. 向海外移民。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移民琉球。琉球(今日本冲绳)是位于中国东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明朝以前就与中国有交往,明洪武五年(1372年)与琉球建立正式的藩主国关系,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廷为了把私人海外贸易力量纳入官方贸易的轨道,加强琉球对明朝的朝贡贸易,实行“用夏变夷”的传统对外政策,决定赐闽人三十六姓给琉球,这是明朝以前绝无仅有的一次由政府派遣的大规模中国民众移居海外的活动。二是移民东南亚。闽人移居东南亚始于唐宋,人数不多。元代之后逐渐增多,特别是明清时期,福建移民东南亚形成高潮,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总数应不少于10万人,其中泉州籍华侨人数约有四五万人。明嘉靖年间,吕宋的中国商贩达数万人,其中漳州籍海商占十之八九,逐渐形成一个个小规模华侨社会群体。三是移民日本。闽人移民日本比较迟,有史料记载的是在唐代。明嘉靖后期倭寇被平定后,海禁稍宽,福建东南沿海地区的民间贸易商、船主、前往日本从事私人贸易的商船与日俱增,长崎为主要贸易港口。17世纪40~60年代,由福建启航的商船,约占赴日商船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左右。难怪明朝廷惊呼:“通倭之人,皆闽人也。合福、兴、泉、漳共数万计。”^②除商人外,还有因避战祸而移居长崎的贸易商、船主及其眷属,也有不愿仕清而随商船东渡移居长崎的明末遗臣、士大夫文人及其仆从眷属,以及应邀前去主持寺院的佛教高僧,和建筑华侨社区寺庙的工匠、雕刻师、画家等。日本元禄年间(1688~1703年),旅居长崎的中国人约有一万人,部分商人定居下来,成为华侨,其中福建籍华侨在人数上居多。

明清时期,福建移民的第二个特点是本省内的再次移民活动异常活跃。从汉晋到明清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北方汉民迁徙入闽的脚步从未停歇过。闽北是北方汉民入闽时最先到达的地点,但由于闽北山区山高林密,交通不便,生产及生活条件较为恶劣,从北方移居来的部分汉民,往往又从闽北地区向闽江下游及沿海平原地带等生活条件较为优越的区域转徙,即我们所说的再次移民。明清时期,随着这些区域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数量急剧增长,农业开发逐渐趋于饱和状态,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促使平原和沿海先开发区的居民逐渐向省内那些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未开发区迁移。这种二次、三次甚至多次移民活动非常活跃,既有不同民系之间的再次移民,也有本民系内部的再次移民,甚至有同一县份的不同乡村之间的移民,再次移民呈现经常性、自发性的特点,总体上是由人口密集的地区向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移民。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光绪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正式废除海禁,允许人民自由出入国,对闽人移民海外产生巨大影响。这个时期,闽人移民东南亚和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既有大量的契约华工,也有许多从事经商贸易的商人与小贩,以及从事各种手工业、种植等营生的自由移民;既有零散的血缘性、地缘性的“连锁移民”,也有

① 尹士俤:《台湾志略》,李祖基点校,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四九八。

有组织的民间集体移民,形成向海外移民的高潮,光绪十七年至民国19年(1891~1930年),出国人数多达116.8万人。道光二十一年至民国19年(1841~1930年)间出国的闽籍华侨,相当多的人属于契约华工,近代福建移民史深深地打上殖民统治的烙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建移民形式有一些新的变化。省内移民以开发山区为主,数十万人城镇及沿海农村居民在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移民山区,为促进山区的开发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同时,随着水利工程建设为主的各种工程建设的进行,引发规模、范围不等的人口迁移,对于这些移民的安置,均设立相应的机构负责有组织、有计划地做好搬迁工作,并给予相应的补偿。至20世纪90年代末,全省因建水库、水电站而移民的人口大约有27万人。省际移民有南下干部和经济移民,南下干部入闽的人数不多,只有6000多人,但作用很大,他们被分配到八闽各地,参加所在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建设,为福建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经济移民以山东林业工人迁徙入闽和伴随上海工厂迁入福建的上海工人为主,人数也不太多,对福建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由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反华排华,大批华侨因莫须有的罪名而遭迫害(甚至杀害),一部分华侨只好回到祖国,成为归侨,安置归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建移民的重要问题。1953~1955年,福建省安置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归侨17299人,至1959年9月底止,安置归侨7万多人。1960~1969年,安置印尼归侨62332人。1978~1979年,安置印度支那难民22288人。据省华侨志统计,到1990年止,福建省共有归侨221633人,其中泉州115484人,莆田市5744人,厦门市13999人,漳州市32285人,福州市32841人,龙岩地区6862人,宁德地区9102人,三明市2869人,南平地区2447人。^①福建省人民政府投入大量物力、人力,妥善安置如此众多的归侨,体现祖国母亲对海外游子的关怀。

改革开放后,福建出现持续的出国热潮,产生了大量海外新移民。据1997年普查,1949~1996年的移民人数为53.35万人,而这一总数的90%以上即约50万人是1979~1996年的新移民。闽籍海外新移民的迁出地更广,呈从南向北、从东向西、从沿海地区向内地延伸发展的趋势。迁入地也从传统的东南亚地区转向欧美发达国家。

综上所述,福建移民史以明代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吸纳外来人口为主,以北方汉民为主体的移民把福建作为求生存和发展的福地,源源不断迁入福建,定居下来,成为福建人;后期以输出人口为主,闽人向周边省份、台湾宝岛、港澳地区、东南亚地区、日本,进而向欧美各地迁移,足迹遍及世界,只要有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就有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福建人!移民贯穿福建历史的始终,它犹如海浪,从北方向福建推进,又从福建向周边地区和海外推进,构成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

三

一部福建移民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福建发展史,移民有力地推动了福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①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华侨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187页;福建省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统计表。

首先,移民大大加速对福建的开发。秦汉之前,福建为蛮荒之地,经济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汉代的闽中仍然是偏僻的边疆,人烟稀少,林深丛莽,并且“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①。而福建偏处东南,自然条件优越,又远离频繁动乱的中原,社会相对安定,因此,它像一块强力磁铁,吸引着北方汉民,从汉晋开始,北方汉民不断迁入福建,前后延续一千多年。

东汉末年,孙吴崛起江东并向南方发展,经营闽中。从建安元年起,孙吴军队五次入闽,前后数十年经营福建,基本上建立和巩固了对福建的统治,并在闽地建立建安郡。五次入闽的孙吴将士数量很多。战争结束后,一些将士就留驻福建,与当地入通婚,建立家庭,也有携带家眷的吴军人定居福建。

西晋末年,惠帝时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中原战争频仍,人民纷纷南下寻找避乱之所,北方汉人又一次大批入闽。东晋时期,南北分立,北方汉人更是大批南下。南渡的北方汉人不仅定居于闽江流域,而且已有不少南迁至晋江两岸。南朝前后170年,其间又不断有北方汉人南下入闽。魏晋南北朝时期入闽的北方汉人有官吏、名流、将士、士族、豪强、农民、佃客、部曲、逃户、起义者、流放者、罪犯、道士、和尚等,可以说,北方社会的各阶层人士都有其大批成员或代表人物在这社会大动荡时期南迁入闽。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北方汉人入闽,带来中原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与福建本地居民一起,促进福建经济的封建化进程。大批汉人入闽,他们或者聚族而居,垦辟田地,或者由佃客、部曲从事各种生产,促进福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此期入闽的北方汉人大多是具有丰富生产经验和掌握一定生产技能的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等,他们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生产管理经验和文化知识,推动了福建耕作方式的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福建生产力落后的状态,福建的农业等各项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到西晋初年,闽北各主要的河谷盆地和山间盆地都得到初步开发,因此才有建安、邵武、将乐等七县的设置。孙吴时期开垦的重点是闽北,西晋时期扩大至闽江中下游,东晋南朝以后更往南移至木兰溪、晋江、九龙江流域,同时各地的水利也得到兴修。福建的农业摆脱了西汉时期火耕水耨的落后状态,提高了水稻栽培技术,推广了小麦的种植。

隋唐五代时期,外地移民仍不断入闽,福建人口持续增长。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朝廷令陈政为岭南行军总管,进军闽南。陈政征服“蛮獠”之后,留守闽南并上表请置漳州以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当时随陈政戍闽的官兵从此就在漳州落籍,有所谓58姓。他们分别屯居漳属各地,披荆斩棘,开拓村落,互为婚配,繁衍后代,为漳州的开发和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唐末光启年间,王绪所率的入闽军民有数万之众,是后来王审知父子创建闽国的基础力量,他们也分别在福建各地落户。福建地处东南一隅,历来中原动乱,福建社会相对安定,因而成为避乱者的乐土。安史之乱时,中原人民纷纷避乱南下入闽。此外,隋唐以来,福建的地方行政区域不断扩增,州县亦大量增设,中央派到福建的官员亦不断增加。这些入闽仕宦者及其家属后代,有相当一部分因某种原因落籍闽中。

隋唐五代时期入闽的江南人民,不仅带来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也带来制造这些生产工具的知识和经验,福建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沿海地区已经开始推广双季稻生

^① 《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

产,粮食产量也进一步增加。随着北方人口陆续涌进福建,使福建人口迅速增加,许多新来移民逐渐深入到闽南、闽西等未开发的区域,福建全境全面开发的格局已经形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朝设立福建经略使,“福建”这一名称首次出现。上元元年(760年),福建更自成一道。元和二年(807年),宰相李吉甫上《元和国计簿》,指出在藩镇割据的局面下,朝廷“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① 福建在唐朝统治者心目中地位的提高,表明其开发确实卓有成效。

降至宋代,闽北农民更是向高处及僻处开拓梯田,梯田已遍布高山峻岭,闽北地区有了较快的发展。杨时在《资圣院记》中记述将乐县的变化:“将溪据闽之上游,地险而隘。……鱼稻果蔬,与凡资身之具,无所仰而足,故五季之乱,人乐居焉。”^② 一些地方志对此也有记载,《建宁府志》云: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在此,故“备五方之俗”。^③《沙县志》云:“沙(县)自南唐张确魁多士,入宋雍熙,而陈世卿趾美登第,当时五步一塾,十步一庠,士以诗书相劝,故邓、罗、曹、陈四姓之子孙接踵升朝,乘朱轮曳金紫者不知凡几也,其他姓勃勃而起者又不可指计。”^④ 沿海等平原地区,则向江河湖泊和滩涂要田。福建沿海人民就是用筑堤泻卤方法,进行围海造田活动,称为圩田或围田。宋绍圣年间,政府下令将闽江下游及入海口所形成的沙滩和海涂开辟成良田。如今福建沿海一带有不少以浦、渚、埭、屿、埔、洲等命名的地名和村落。^⑤

总之,移民大大加速福建的开发进程,至宋代,福建大多数地区得到开发,社会经济不但走出长期落后的境地,而且奇迹般地在短时间内跻身于全国发达地区行列,成为东南全盛之邦。诗人张守在《毗陵集》中有诗句云:“忆昔瓯越险远之地,今为东南全盛之邦。”集中地反映时人对福建经济突飞猛进的赞叹。

其次,北方移民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并创造出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

秦汉之前,福建居住着闽越土著,其最重要的文化标志是以蛇为图腾和断发纹身,“信鬼神,重淫祀”,巫术充斥整个社会。秦代汉初,中央政府虽然在福建设立闽中郡和闽越国,但由于均实行“以闽治闽”的方略,所以汉文化在福建的影响甚微。汉晋以后,随着北方汉民大批移民福建,汉文化开始在福建逐渐传播,直到隋以前,居住在福建境内的汉族人数并不太多,且大多数人尚处于变化不定、糊口维艰的境地,根本无心也无法去创造能体现自身特色的文化。这种情况到唐五代时有了明显的改观。一方面,随着汉人的不断移民福建,汉族与土著民族之间的融合速度加快了。由于移民中男性比例较大,特别是唐中期陈元光和唐末王审知的部属(共三万五千多人)定居福建,使汉民的男女比例更加悬殊,其中不少汉族男子与土著通婚,作长期落户福建的打算。陈政的部属丁儒在《归闲诗二十韵》其二对唐中期闽南地区的民族和民俗融合作这样的描述:“漳北遥开郡,泉南久罢屯。归寻初旅寓,喜作旧乡邻。……土音今听惯,民俗始知淳。……辞国来诸属,于兹缔六亲。追随情语好,问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七。

② 杨时:《龟山集》卷二四。

③ 嘉靖《建宁府志》卷四《风俗》。

④ 康熙《沙县志》卷一《风俗》。

⑤ 以上参见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馈岁时频。相访朝和夕，浑忘越与秦。……呼童多种植，长是此方人。”^①五代时，王审知的部属与土著通婚的现象更加普遍，故福州方言称男子为“唐铺人”，意为唐代的铺兵（当时十里为一铺，派兵驻守），妇女俗称“诸娘子”，意为闽越无诸国的女子。民族的融合对汉文化在福建的迅速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北方移民不断入闽，福建人口的迅速增长（唐开元年间已有户籍贯 108991 户，比隋大业三年增长近 8 倍），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从而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加上地方官注重兴办教育，网罗人才，使福建文化长期落后中原的局面有所改观。志书称：“文教之开兴，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而日益盛。”^②宋代，福建社会相对安定，生齿日繁，人口剧增，据统计，宋嘉定年间福建人口有 1599215 户，比唐开元年间增长近 15 倍。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条件下，宋代福建经济进入大发展时期。随着经济的长足进步，文化也一派繁荣。教育事业发达，据统计，宋代福建有县学、州学 56 所，书院 75 所，还有数以百计的书堂，学校书堂遍布城乡。教育的发达和读书风气的形成，使福建科举鼎盛，人才辈出。据不完全统计，宋代福建进士多达 7038 人，占全国进士总数 35093 人的五分之一；宋代宰相共 134 人，福建籍宰相有 18 人，居全国第三位；被《宋史》收入的福建名人有 179 人，为全国之冠。宋代福建还涌现了一大批名扬中外的杰出人才，有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有天文家苏颂，有法医家宋慈，有史学家郑樵和袁枢，有书法家蔡襄，有著名的诗人杨亿，慢词大师柳永，诗论家严羽，文学家刘克庄，等等。时人周必复颇为自负地宣称：“今世之言衣冠文物，必称七闽”。^③

福建文化对中国、乃至世界作出最大贡献的是闽学。闽学指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福建朱子学派，发端于史称“海滨四先生”（又称“闽中四先生”）的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等，他们都是福州人。将乐的杨时、沙县的罗从彦和南平的李侗（史称“南剑三先生”）则是闽学的先驱。胡安国、胡寅、胡宁、胡宏、胡宪等“胡氏五贤”对闽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和启迪。而朱熹则是闽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学说的形成标志着闽学的确立。朱熹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他以儒家的伦理学说为核心，糅合了佛教、道教及诸子学说，建立起以“理”为中心，囊括自然、社会、人生等各方面内容在内的思想体系。《宋元学案》称，他的学说“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朱熹去世后不久，宋嘉定五年（1212 年），皇帝批准朱熹的《四书集注》立于学官，作为法定的教科书。从此，闽学不仅获得了正统地位，而且在直至清末的近七百年中一直居统治地位，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而且还波及朝鲜、日本等国，近代又传入西方，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说。

福建文化对台湾的影响至深至广，通常所说的“台湾文化”实际上是福建文化（主要是闽南文化）的移植和发展，台湾的方言、民俗、宗教、信仰、戏剧、教育等等无不从福建传去。以宗教信仰为例：明末清初，闽人渡台，首先面临的是要跨越充满危险的台湾海峡，为了战胜台湾海峡的巨大风浪及入台后面临的险恶环境，他们将家乡的妈祖、保生大帝、清水祖师、观音、关帝、广泽尊王等神像或香火袋作为护身符带入台湾，建立各神灵在台湾的开

① 康熙《漳州府志》卷二九《艺文》。

② 陈衍：《补订八闽诗录》叙。

③ 《南宋群贤小集》第九册《端隐吟稿序》。